

# “校车安全”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整顿校车不能一停了之

聚焦全国两会  
基层声音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校车安全”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基层代表委员热议。

“夺命校车”去年频现,刺痛了社会神经。有关方面迅速部署“整顿”,校车安全“新规”制定快速推进。但部分来自基层代表委员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校车服务一“停”了之,供需出现新矛盾,部分家长无奈选择“黑校车”。

## “整顿”不是“停开” 防止责任转嫁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注意到,今年春节开学后,海口市一些学校的校车停开,校车服务被取消,这使孩子们上下学的方便和安全成为新问题。无奈之下,一些家长只能凑钱租车接送孩子。

“家长自发租车,反而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史贻云委员表示担忧,整顿校车安全是好事,但不能一“停”了之。如果没有配套跟进措施,反而使校车安全问题“由明变暗”,学校规避了责任,风险转嫁给家长和孩子。

校车“旧的去了”,为何“新的没来”?代表委员调研发现,成本过高、无力承担是学校“停开”的主因。

“财力有限是目前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以海口市寰岛实验小学为例,如果要满足全校学生的乘车需求,需要购置30多辆车才行,仅购车就需要近2000万元,加上聘请司机的费用、油费消耗等运营成本,学校实在无力承担。

“校车安全与上学方便都很重要,单纯为了安全而一‘停’了之,是不负责任地开倒车。”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凤宝说,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安全和方便“两手抓、两手硬”。

## “黑校车”重新抬头 亟待投放“合格校车”

“一些学校整顿停开校车,给‘黑校车’提供了生存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河北区政协顾问马丰耘说,目前家长合伙包车现



图为海口昌茂花园学校“大鼻子”校车让学生上下车时,司机将车身左侧“STOP”的指示牌打开,提示后面所有的车注意避让。

象普遍,“黑校车”为数不少。为了揽客挣钱,“黑校车”普遍存在私自拆改、超员上路问题。

冯幸耘委员的担忧,引起了史贻云委员的共鸣。他说,“在海口等一些大城市,不少小学生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就放学,家长没下班,没有校车,怎么办?”

“各级财政应拿出更多钱采购合格校车。”李建保等代表说,“只要真心想解决,现有财力完全能够做到。”

一些基层代表委员还建议,在增加校车配备的同时,还可通过延长城乡公交线路、增加公交车密度、以优质公交车定点接送、区域内学校共享校车资源等方式,解决学生上学不便问题,从而减少投入,降低成本。

深层求解校车安全问题,还应从教育

资源的均衡配置入手。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

对此,宋心仿代表说,前些年许多地方实施撤点并校,总体上优化了教育资源,但一些农村地区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并校,给路远的学生上学带来不便。他建议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对现有学校布局进行再调整。

## “提标”固然重要 安全重在监管 是不是校车“标准”高,安全就高枕无

忧?答案并非如此。

一些基层代表委员说,仔细观察去年的多起重大校车事故会发现,违法严重超载、非法改装车辆、不按交通规则行驶,以及校车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存在漏洞,才是酿成悲剧的真正“祸首”。

“这一点恰恰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张凤宝等代表说,安全绝不仅仅只是车好就行,“硬件”保障只是提高校车“安全系数”的一部分,校车监管、执法等高标准运营管理,才是确保安全的关健。

记者 刘元旭 王海鹰 傅勇涛 赵叶萃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教育质量很难提高啊。”陈赛娟代表半开玩笑地说。她表示,在欧美一些高校,博士学位只有20%到25%的人能拿到;有的本科生拿不到四年的学士学位,就拿两年的“B档”学位。“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做?第一,要保持高校的品牌;第二,社会没有给学生那么多压力;第三,学生自身心态平和、抗压性比较强。”

东华大学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长严诚忠代表表示,当前应当更加关注学生心智模式的培养,使学生具备驾驭人生和享受生活的能耐。“做对一件事不代表着一定成功,偶尔做不成、做错事也不代表失败。家长和社会不应拘泥于学生一次成绩的上升或下降,而要关注他们的心智和活力。”严诚忠说。

记者 杨金志 仇逸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 研究生为啥还像“长不大的孩子” ——听代表热议“情商教育”

“按理说研究生应该比大学生更成熟,但我们也不敢给太多压力。我就碰到过有的博士生因为想不开,有比较极端的行为。我们只能循循善诱,从正面启发教育。”

6日上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恩多代表在上海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高等教育中的“情商教育”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代表深有同感:“曾经有位研

究生因为没有发表文章,暂时没有拿到学位。他很着急,也写了文章,但是质量不过关被杂志退稿了。结果他就情绪失控,把东西全都扔在地上,几乎就要对自己动刀子。”

王恩多代表说,现在的教育太过重视智力,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数学,而在情商教育、抗挫折教育方面的缺失很大。“我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才,20%靠智商,80%靠情商和抗挫折能力。”

她说,现在很多家庭就一个孩子,父

母和祖辈的希望都押在这一个孩子身上。如果孩子不从小接受完善的道德教育、情商教育,以后成长会很不利。“大楼建起来很困难,但是一根火柴就可以把它烧掉。”

宝钢研究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杜斌代表是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他在讨论中提出,当前高等教育过于宽松,应当设置一定的“不及格率”“不通过率”。对此,王恩多代表颇感无奈:“杜斌的提议好是好,我就是有一点紧张,担心出事情呀!”

“如果都像王老师那么仁慈,我们的

## 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事业单位无视组织、人事部门规定,屡屡触犯红线, 频繁出现的“萝卜招聘”事件,引起网民强烈不满——

# “萝卜招聘”何时休?

聚焦全国两会  
热点追踪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廉政建设亟需加强。”许多网民在对这句实事求是的评价给予掌声的同时,认为去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萝卜招聘”事件,是百姓在廉政建设上反映的突出问题之一。

两会召开之际,部分代表委员为“萝卜招聘”现象细心把脉并开出药方。

## “萝卜招聘”呈现五大类型三个特点

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事业单位无视组织、人事部门规定,屡屡触犯红线,频繁出现的“萝卜招聘”事件,引起网民强烈不满。

在网上,有网民列举了近年来“萝卜招聘”的五大类型:

一是“定向招聘”:2010年,河北省盐山县设立了一个名为“县长特别奖”的奖项,并承诺获奖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或者获奖个人的子女可以招聘进事业单位安排工作。

二是“近亲招聘”:湖南省怀化市鹤岗区“2010年乡财政所和社区招聘简章”中有“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鹤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等“条件”。

三是“内部招聘”:广西华侨学校2011年招录的68名人员除5人外,全部为本校“临时聘用”教师,面试环节也存在

不公平现象。

四是“会议招聘”:2009年7月,广东省东源县法院院长徐周定主持法院党组会议,同意不经考试就招录自己的儿子徐行为工勤人员。

五是“陪考招聘”:2009年12月,浙江省平阳县电大招聘校长林传怀之子孙林廷耀担任教师,而此前的招考中仅林廷耀一人真正参加考试,另外两人是林家请来的“考托”。

一直关注“萝卜招聘”事件的全国政协委员柯锦华表示,近年来发生的“萝卜招聘”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绝大多数发生在县(市、区)乡等基层单位;二是岗位以事业单位为多,通俗一点就是虽然不是公务员但也属于吃财政饭;三是应聘条件指向明显,说白了,就是让别人进不了内定好了的“萝卜坑”。

全国人大代表迟凤生说,这些年,“萝卜招聘”花样翻新,如个别地方领导看准了“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可以互调”的机会,先把自己的孩子“走后门”弄到相对容易进的事业单位,待升到一定级别后再调回党政机关。这是“萝卜招聘”的新趋势。

“萝卜招聘”为何“病灶”难治、劣根难除?

网友“巨猫一号”说:“萝卜招聘”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了,户口、性别、学历、专业、身高、特长、父母身份、家庭背景都敢写到招聘简章里。

“萝卜招聘”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重要原因是当前就业压力大。新华网2011、2012两会调查中,“实现就业公平”一直是网友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说:“萝卜招聘”的核心是以权谋私,个别领导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利,给子女、亲戚安排工作。由于我国当前的组织、人事制度限制,必须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所以就变换手法,照着葫芦画瓢,划定‘范围’,发布招聘公告。”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说:“萝卜招聘”一方面反映当前组织、人事制度的刚性约束比较有效,但同时也有‘机’可乘,有漏洞可钻,使一些领导干部能够假借公开招聘之名,行暗箱操作之实。”

“萝卜招聘”必须追查到底问责到人

在近年来各地发生的“萝卜招聘”事件中,有关部门在媒体曝光后迅速介入,调查真相,做出“暂停招聘”、“取消某某面试资格”、“删除有关规定重新招聘”等处理决定,并对一些当事人予以处理。

网民认为,今后对涉“萝卜招聘”单位领导和参与组织人员,应按有关规定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说,治理“萝卜招聘”需要八个字:追查到底,问责到人。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 “涨工资”机制: 惠民改革能否缩小收入差距?

聚焦全国两会  
热议

“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两句话引起网民强烈关注,他们联系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十二五’期间职工工资翻番”规划,发出了这样的期盼:这些顺应民意的惠民“涨工资”改革目标,如何才能落到实处、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 “提低”更要“控高” “倍增长”不能“被增长”

【网评】在门户网站上超过160000名网友参与有关如何减少收入水平差距的调查显示,22.6%的网友认为应提高工资标准、并设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调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不久前公布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扩大,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金融业为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为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而在1980年代,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仅为1.6—1.8倍。

【建言】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认为,工资的“提低”事实上应该和“控高”相结合,更加注重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性,调控部分国企高管过高薪酬和某些收入过高行业的工资水平过快增长,努力缩小收入差距,防止居民收入“倍增长”成为统计上的“被增长”,避免惠民政策成为“纸上画饼”。

## 不让CPI“偷”走幸福感

【网评】“工资”涨得虽快,却也跑不赢CPI。不少网友认为,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间自己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增长感”却没多少,高企的CPI“偷”走了自己的幸福感。

【调查】自四川来长三角地区打工的王树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去年工资从2500多元涨到2800多元,但是房租从100多元涨到200多元,每个月的生活费也从八九百元涨到了1200多元,“每个月能存下来的钱反而少了两百来块。”“涨不涨工资是一

方面,关键是购买力是不是增强了。”

【建言】代表委员认为,要真正使居民有“增长感”,除了要让工资外收入和福利也一起上升外,还需要调控物价,让工资倍增的实惠落到实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反弹。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认为,惠民政策提高了百姓的期望值,要让这样的期望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幸福,不仅仅是数字绝对值上的增加可以解决的。“要提高职工工资,更要减少居民工资‘毛增加’和幸福感‘净增加’之间的差值,不要让CPI绑架了百姓的幸福感。”

## 体制内外“涨”声都要响起来

【网评】上海网友“方向明”认为,职工收入增长的难点在于如何提高非编制内、非事业单位、非公务人员、非央企人员的收入水平。还有网友担心,体制内职工能受益于政策,但体制外职工就被“遗忘”。

此外,新浪网友“格式化”认为,除了要使体制内和体制外职工都得到实惠外,对企业而言,本身并不具有承担人力成本的责任,“倍增长”会成为小微企业的“不可承受之重”。

【调查】记者在东部地区采访发现,一些企业对“职工工资增长”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物价水平的走高和部分行业“用工荒”的连年出现,企业用加薪手段吸引员工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成本增加、汇率变动、税负偏高等因素,企业又在员工增收方面“力不从心”。

【建言】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认为,职工收入提升是整个收入结构调整的一部分,政府能掌控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的人员收入,因此要防止“政府能掌握的部分涨,而私营企业不涨”的现象,应通过推行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强化“体制外”职工工资制度的健全和落实,以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如果一味地要求增加职工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只‘加压’不‘减负’,很多中小企业利润微薄,事实上难以承受,这对实体经济也是一个打击。”宗庆后建议,政府在为职工“涨工资”的同时,也要给企业在税收、物流等方面减减负,保护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 民政部: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工作基本完成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邹伟卫敏丽)“经过10年的酝酿、讨论,集思广益,特别是采纳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具体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民政部纪检组长曲淑辉6日列席全国政协妇联界别分组讨论会时介绍。

“到2011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到1亿6700万。”曲淑辉说,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太相同的是,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历史阶段,养老问题对政府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曲淑辉说,围绕养老服务问题,国家层面正在推进两件大事:一件是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另一件就是把养老服务作为一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列入“十二五”发展规划。

“根据这个规划,到2015年,要基本形成一个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监管到位、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一个具体的目标是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养老床位达到30张。”曲淑辉同时介绍,在这个专项规划中,还对养老服务的设施、管理等方面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 房产税改革全面推开“箭在弦上”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房地产税制”。财政预算报告也指出,要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各种迹象表明,房产税改革全面推开已“箭在弦上”。

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自去年初在上海、重庆两大直辖市启动。历经一年之后,房产税“实施效果逐渐显现”。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在调研后表示:“重庆和上海试点运行很好,对促进当地合理有效的使用土地、完善地方财政体系意义重大。”

“加快城镇住房信息系统”将成为房产税推开扫去障碍的第一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证实,今年上半年,40个重点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将实现全国联网,各地争取2013年实现全市、全省联网。同时,北京、武

汉、上海等城市已相继修改普通住宅的认定标准,提高“非普通住宅”门槛,使更多普通住房享受受到契税优惠。

除尽快建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外,加征房产税是否增加普通民众税负压力也是开征房产税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

“不能将房产税定位到‘抓钱’上,那样只会加重公众‘税收焦虑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房产税首先应定位在个人住房调节税,房产税越多,越超前。

“即便今后房产税全面开征,也不是向每一个人征收,应对满足基本居住要求的房产做出充分的扣除。”刘克崮建议。

记者 吴雨 齐中照 林晖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 王雄代表建议 出台按月发薪制 解决农民工讨薪难

本报北京3月6日电(特派记者陈成智 黄晓华 彭青林)为什么每年春节之前各地都有大量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出现集体讨薪现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王雄代表今天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国家出台相关刚性政策,让建筑业农民工可以按月领取薪酬。

今年春节之前,在海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直接过问下,省有关部门展开一场政府主导、声势浩大的讨薪行动,帮助640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3300万元。问题虽然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是滋生此类问题的土壤

显然尚未清除。

王雄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加强对建筑工程企业的监管,从现实情况看,许多欠薪企业是因为工程不断转包导致,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杜绝违规层层转包的现象发生。

王雄说,许多建筑企业不是按月给农民工发工资,而是按季度甚至半年才发一次工资,直接给拖欠预留了大量时间。如果从工程建设之初,就规定企业必须按月给农民工发放工资,不得无故拖欠,就不会造成大量欠薪的行为发生。即使有欠薪行为,一般也只是欠一个月工资,处理起来也简单、容易得多。

陈国诚代表指出,近年来,应对物价上涨过快,我省为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压力,多次启动低收入群体补贴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提高补贴标准。这正是我省民生建设不断适应新实际的有益尝试。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 海南民生新考量

(上接A1版)2011年,全省民生支出546.95亿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70.2%。

社会在不断发展,百姓的期待不断提高,民生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吉明江代表说,近年来我省在民生制度的广覆盖上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保障标准上还需要适时提高。如目前海南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待遇,还不能根本解决看病贵问题,广大群众期望能够加大保障力度。

吉明江同时指出,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新的民生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我们及时应对。

聚焦全国两会  
新华时评

## 就业优先: 学会并坚持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务必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就业优先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投资、出口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拉动力,只靠投资拉动是不可持续的,靠出口往往受制于外部市场的变化,目前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最大,而消费的前提是老百姓有工作,手里有钱。因此人们说,民生是最大政治,而就业又是最大的民生。

就业优先就要求各级政府统筹兼顾,发展能够安排大量劳动力的第三产业。要求各级政府爱惜那些能够解决大量就业问题的中小微企业,切实减轻他们的税费负担,并在金融、工商、税务、质检、环保方面提供贴心、便捷的服务。要求各级政府更加勤政,善待个体工商户和自谋职业者,不能为了城市的“面子”而减少这些就业岗位。

就业优先要求各级政府有针对性、有规模地开展技能培训 and 创业培训,使各类人才和劳动力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同时加强服务和信息引导,解决地区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供需对接;还要改善就业环境,缩小行业间、人群间在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差距,使劳动力流动有序、顺畅,使企业稳定、就业充分。

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将始终面临就业总量压力巨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格局,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任务十分繁重。就业优先,要学的很多,要做的更多。

记者 徐博(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